文学新观察

写作课能培养大作家吗？

宋 庄

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雕塑

继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开设创意写作专业后，有“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说法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今年正式招收“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30年前，王安忆第一次走出国门，和母亲茹志娟一起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营，当时，王安忆心里悄悄地埋下了两个梦想，她很期待以后有机会的话，一要办写作班，二是办国际写作计划。这个计划在20多年后得以陆续实施。

她想象之外的是，不仅复旦大学开设了创意写作班，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等全国各地高校都开始广泛涉及这一课程。难道小说家真的可以像种庄稼一样，埋下种子就可以收获？课本和教学能否让写作者彻底放下“枷锁”，如鱼得水地开始写作？

作家：写作不可教

“我最早接触写作课程是在爱荷华，爱荷华的国际写作计划是最闻名的，他们是请国外的作家作为驻市作家。那次出国的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我第一次知道写作是这么教的，我们在国内也听文学修养的课，基本上是老师讲，学生听。我到了国外，发现他们原来是这么学习写作的，当然我也怀疑能否教出作家。想不到我今天也在做这样的教学。”王安忆说。2009年，复旦大学首推创意写作硕士，培养高学历作家。作为领衔授课的作家王安忆，却并不认为通过这样一项工作能培养出多少作家。“创意写作给很多人的感觉是要培养作家，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作家是需要天赋的。创意写作班从来没有把培养作家作为目标，只是希望藉此让学生更加直接地了解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安忆的课程是写作实践，和国外的方式一样，每人交作业谈作业，没有教材。她教创意写作，也建议学生读类型小说，让他们知道一些基本规则。但是，她强调，作家还是需要才华。她不认为作家是可教授的。

“作家不能教，和才能有关系，学府生活对成为怎样的人有很大关系。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规划设计所能达到的。可是写作还是有人力可为的方面，比如文字的把握，情节的安排，故事的设置。我一直认为中国很需要文学教育，现在的文学教育很弱。我教写作，不期望学生们能成为作家，至少让他们懂得写作的乐趣，培养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当个好读者。”

王安忆说，职业写作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写出好作品的作家都不再写作，不能简单地用才华不够或江郎才尽来形容。职业写作必须解决如何表达的问题，这要求作家有更多的认识和更理性的准备。中国作家多数生活经验都很丰富，问题是当你的感情饱满、生活经验饱满、也有才华的时候，未必能写好小说。因为还有技术问题。“有这个基础，可能会使小说创作变成可以稍微掌控的事情。”王安忆说，中国当代文学里，缺乏技巧的表现之一是消耗材料非常多，这使我们写作不能持久。西方小说里很小的一点东西，可以越滚越大。

而写作课可以很好地解决写作技巧的问题，但是也会带来另一个弊端。哈金曾说，从美国过来的小说，不是特别出众，都能用；欧洲来的小说，好的非常好，差的非常差。

写作可以学，我来教你登上“作家阁楼”

与作家王安忆的观点恰恰相反，《写作创意教程》的作者杰里·克利弗认为，写作是可以学习的。他说，在美国大学设立的时候就有这门课程。有些编辑也是好的写作的老师，尽管他未必擅长写作。麦克斯韦尔·珀金斯就是一位很优秀的编辑，教出了不少伟大的作家，包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可是终其一生，他连小说创作的边儿都没沾过。杰里·克利弗一直在研究小说创作的过程，他分析，每个作家获得成功的基本要素都有共同点，即一是写作的欲望，二是写作的技巧。“你要知道你的作品一开始什么也不是，你要有写得不好的心理准备。就算你写得不好，也要继续写，不停地写。一般至少要写5遍。写好的故事需要不停地修改。每个人改到两到三遍的时候会不耐烦。如果你觉得厌烦，你要想想哪里让你觉得很烦，你得知道什么问题使你不能进行下去了，把问题的症结找到。也许你会特别沮丧，那么你放轻松去做点别的。让你的想象力去驰骋。有时候灵感会再冒出来。”

不知道克利弗是否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空中楼阁”，用来比喻幻想或脱离实际的理论、计划，反正他在芝加哥创办的写作培训班名叫“作家阁楼”，并且越叫越响亮。汇集他从教30余年来授课精华的《小说写作教程》，被译者王著定评价为“为畅销图书、短篇小说、影视剧本以及舞台剧本创作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这位曾经苦恼于小说创作的大学讲师，现在成了无数人推崇的写作大师。当然，他也承认，有的人做运动员很好，未必能成为好教练；有的运动员表现一般，却能成为好教练。言外之意，即使有些人写作不好，但他懂得写作技巧，照样可以教出好的作家。

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多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严家炎曾经对学生们说，“进我中文系的，将来不要指望当作家。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适于文职工作的人才。”这句话在很多年里被北大中文系奉为金科玉律。国内大学都是这样，认为大学里培养教授、专家，不培养作家。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写作某种程度上是要有天赋的，杰里·克利弗的讲述似乎打破了写作的神秘性。不过，这样大家掌握的写作技巧岂不高度雷同了？杰里·克利弗说：“大家用的技巧一样，但是故事不一样。每个人的情感模式不一样，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写出来的作品就不一样。有天赋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作家；没有天赋也可以写得很好。也许你的作品不伟大，但是写得足够好。”

写作课的利与弊

北京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招生简章显示，该专业培养具有深厚专业基础、高水平写作能力和出色创意才华的高层次的应用型写作人才。

陈平原对此的解读是：作家需要文学修养，但个人的天赋才情以及生活经验，或许更为关键。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很少是大学刻意栽培出来的。再说，北大中文系承担培养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文献研究专家的任务，倘若一入学便抱定当作家的宏愿，很可能忽略广泛的知识积累，到头来两头不着边，一事无成。大学的文学教育（不限于中文系），其主要功能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我们的目标是：酿成热爱文学的风气，培养欣赏文学的品位，提升创作文学的能力。

陈平原说，“大学”需要“文学”，“文学”可以“教育”，这都没有问题；容易引起争论的是，什么样的“文学教育”才算是成功的。好的“文学教育”，必须兼及“专业知识”与“个人趣味”，这方面，学者与作家，其实各有专擅。

南泥湾的香菇面（外一篇）

高红十

马年正月十五，笔者回延安过大年。一天忙完事情，电视台小伙子请我吃香菇面。他说这面属于大众快餐，一来省事，端上就吃；二来不贵，一碗面15元，笔者欣然同意。

等面时，小伙子抢着从筷筒里捡筷子分发。问为甚？笑答，喜欢。分筷子能生女娃。不都想要男娃么？我弟兄两个，就想要女娃。自然接受并传递的民俗，令笔者感到温暖。

面上来了，人脑那么大一海碗，高高挑起的面条润泽筋道，做浇头的香菇肉头厚，几棵碧绿青菜好吃又养眼。连汤带面吃下去（一般人吃不完），脑顶到脚趾全是暖的。

小伙子说，香菇面最有名在南泥湾，那里种的香菇好。笔者心中又是一动。曾经在南泥湾插队3年多，印象南泥湾就是大生产的代名词，三五九旅、老镢头、开荒种地（南泥湾还种稻子）、自力更生等硬梆梆语系，何年有了香菇面，竟然一无所知。可见个人渺小，经疏纬稀的见识覆盖不了30多年的发展变化，和30年后的日月光景。30多个春夏秋冬季节流转，理应有新鲜事物出现生长，不说替代，至少补充丰富南泥湾的整体印象。

这下好了，有了香菇面，介绍南泥湾，不光有刚性的大生产，还有柔性的香菇面，前者历史，后者当下，前者入脑，后者饱肚，互补着真实，编织着完美。

香菇面吃完，笔者喝了3碗面汤，理由，好喝太太——陕北话：非常好喝的意思。

保暖内衣

安塞的腰鼓有名，有名到安塞城中高高山上，修了一座大红腰鼓，有名到新中国60年大庆游行队伍中有一支安塞腰鼓方阵。马年元宵节，安塞社火就在巨大腰鼓的注视下进行。自然是绚丽红火无与伦比。笔者借用两把红扇，跟在街道办队伍之后，文化系统队伍之前锵锵齐锵齐扭起来。

扭之前笔者捏捏一位红袄绿裤婆姨的胳膊，分明不厚，问她，冷了不？婆姨笑答，不冷，我穿保暖内衣。一句“保暖内衣”几乎让笔者泪奔。

想起插队那些年，过年村里也扭秧歌，也有锵锵齐锵齐的锣鼓声。扭的人大半穿空心棉袄，棉袄被汗腌土沤了一年，早不暖和，因为伙食差，粮少无油水，扭两圈肚子就空了，腿脚就软了，队伍也就散乱了……保暖内衣，听也没听说，解（念hai）也解不下（陕北话不懂意思）。

眼下安塞过大年闹社火，满城桃红柳绿，怎样鲜艳怎样扮。女子风摆杨柳招风引蝶，后生飞天扑地耀武扬威。为了身段好看，他们穿保暖内衣；为了脚步灵活，他们穿品牌鞋；为了精神头十足，他们肚里有扛硬饭食打底。

笔者感慨，陕北的日子，过去一穷二白乡亲们的日子的确过好了，也过美了。

水调歌头

忆焦裕禄

（外一首）

林 峰

谁引一壶酒，长酹向中州。飞鸿声里、有我遥绪共云流。倚槛江山锦绣，照眼桐林泛绿，天际瑞华浮。不复旧时景，遗爱满千秋。

赴颠危，倾肝胆，谱宏猷。知君尽把、万家忧乐系心头。借得移山浩气，来润桑田千亩，造物未迟留。夜夜黄河上，毅魄耀银钩。

延安宝塔山

望中古塔气豪雄，犹带千年霹雳风。
绝顶云疑春染碧，当头日似火烧红。
蛰龙已起神州北，斗柄堪辉玉宇东。
延水翻腾山下过，涛声更比鼓声隆。

两岸作家合写长篇小说《原乡》

文 一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原乡》描写上世纪80年代，台湾老兵突破当局重重封锁，踏上了漫漫归乡路，书写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讲述了从两岸隔绝到台湾当局开放探亲那将近40年的特殊年代，两岸亲人之间日夜思念、隔海相望的感人故事，演绎了民族史上深沉的乡愁。《原乡》中浓墨重彩刻画的台湾老兵群体，可谓两岸和平交流的先行者，是他们在27年前不顾个人安危，发起返乡探亲运动，终于促成台湾当局政策的转变，也开启了两岸共谋发展的契机。

《原乡》由台湾著名编剧、作家陈文贵和大陆作家叶子联袂创作，是第一部由两岸作家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海峡的合作，而且是跨越两个时代的作家的合作。当陈文贵先生担任编剧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国内引发观影热潮时，大陆女作家叶子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这两位作家看似毫无交集，其实有内在的联系，那就是他们对老兵以及老兵家人命运的关注。

祖籍厦门的陈文贵先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一个个大陆、台湾、香港的老兵故事，他们饱受亲人离散之痛、思念家乡之苦，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圆了还乡梦。老兵们的经历深深震撼了作家那颗敏感的心，他说：“我要记下这一段不容忘却的庄严历史。”

著名的东山寡妇村，就位于叶子的家乡漳州，一夜之间，大半青壮男人被抓壮丁去了台湾，叶子少女时代就熟知“兵灾家属”的悲剧，也耳闻过回乡老兵“台湾一个家，大陆一个家”的辛酸与无奈，她为这一代人的命运而感叹，她说：“我要从陈老先生手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老兵的故事写下去。”

评论家认为，《原乡》是感人至深的作品，触摸到了中华民族心底最深切、最柔软的层面，台湾老兵的命运折射中国60年的政治风云。

一部了解中国发展模式的力作

作家莫伸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以中央历年下发的“一号文件”为切入点，从中国农业遭受“左”倾思潮以及由此带来巨大挫折的反思开始，截取当代中国农村具有代表性的生产、生活场景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以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为什么党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要首先在农业上起步并实现突破。选题入选中宣部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图书项目。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真实、具体、生动的中国农村变迁史和中国农业发展史，眼界开阔，观点精辟。

《红色年轮》追寻红色记忆

中国书籍出版社与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编辑委员会共同组编的《红色年轮》系列丛书日前出版第一辑4种：《我的爷爷朱德》、《我的父亲左权》、《我的父亲马本斋》、《我的父亲刘毓标》，该套丛书均为革命元勋后代对先辈革命生涯、战斗经历的回顾，对先辈高尚品格和理想境界的追忆，内容殷实，情感真挚。全国政协委员、朱德之孙朱和平等在丛书座谈会上表示，革命先辈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在人们脑海里烙下深深的印记。（凯 佳）

林凯旋诗歌表达人生感悟

诗人林凯旋诗集《飘零》、《前世的约定》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两部作品分别由作家出版社、线装书局出版。这两本作品反映诗人对美好人生的追求和感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茶”品中的哲理。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从这两本诗集中能体会到作者真挚心灵的表达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感悟和禅意的表述，真切动人。作品语言淳朴、文笔清秀，极具渲染力。

王蒙：坚持没有放弃的事情就是爬格子

刘凯佳

年届八旬的王蒙表示：“几十年来，我坚持没有放弃的事情就是爬格子，以后还会继续爬格子，写出作品来请读者批评、帮助。”这是他在日前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王蒙文集》发布暨新书研讨会上所说。如今，王蒙已走过他文学生涯的第60年。从50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上世纪80年代极具艺术探索性的小说，再到近10年来的传记、学术文章等，王蒙以他独特的人生经历、文学素养、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创作之路上不断前行。他的作品涉及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各领域，内容丰富，风格鲜明，题材和体裁多样，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蒙文集》约1600万字，主要包括长篇小说8卷，中短篇小说7卷，散文随笔、诗歌4卷，文学理论、评论4卷，还有《红楼梦》研究系列、老庄研究系列、自传回忆录系列及演讲访谈录等共45卷。通过本套文集，可以全面了解王蒙的创作历程和成就，了解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贡献，也可以从中窥见60年来中国文学，以至社会、文化发展的轨迹。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表示，王蒙近10年的创作超过了其之前50年的创作总和，“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谁也不知道未来10年王蒙先生还能创作出多少作品。”

王蒙说，自己几十年来的创作就是伴随着各种评说进行的。听了很多表扬的话，也有很多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文章都可以编一套上百万字的集子了。“我愿意当一个靶子，供大家争论、思考”，如今王蒙在创作道路上仍未停歇，仍然充满思想活力，不断有新作问世。

神州

春恋 徐大庆摄